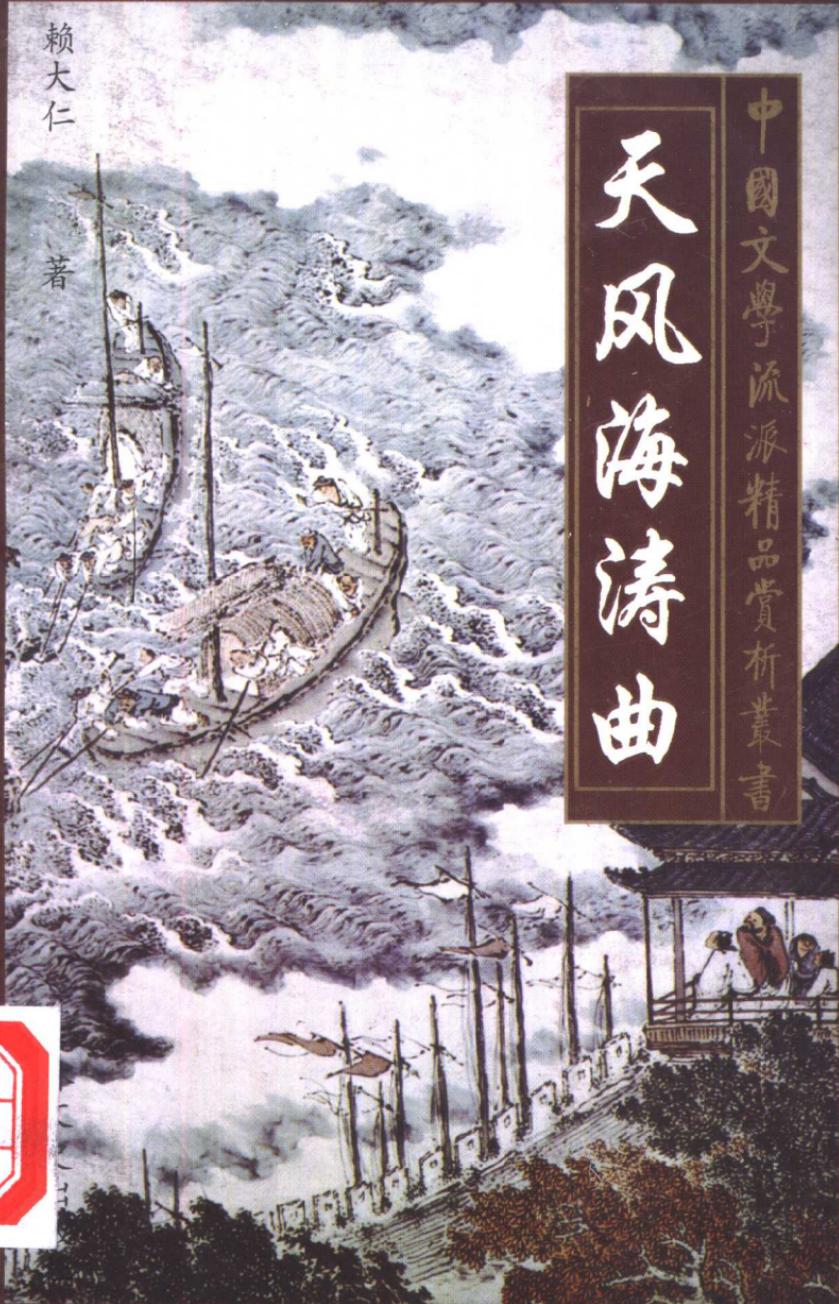


中國文學流派精品賞析叢書

天風海濤曲

賴大仁 著



中国文学流派精品赏析丛书

天风海涛曲

豪放词精品赏析

赖大仁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新登字 07 号

Tianfeng Haitao Qu

天风海涛曲

赖大仁 著

责任编辑:吕海江 徐潜

封面设计:徐潜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1.375 印张 4 插页 238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长春市东新印刷厂印刷 印数:1—6 000 册 定价:13.50 元

ISBN 7—80626—101—X/I·11

目 录

前 言	(1~17)
范仲淹(一首)		
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	(19)
王安石(二首)		
桂枝香(登临送目)	(24)
浪淘沙令(伊、吕两衰翁)	(29)
苏 轼(五首)		
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	(33)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37)
念奴娇(大江东去)	(43)
水调歌头(落日绣帘卷)	(48)
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	(53)
黄庭坚(一首)		
念奴娇(断虹霁雨)	(59)
晁补之(一首)		
摸鱼儿(买陂塘)	(63)
贺 铸(二首)		
六州歌头(少年侠气)	(68)
小梅花(缚虎手)	(74)

叶梦得(四首)

- | | |
|-------------------|--------|
| 水调歌头(霜降碧天净) | (79) |
| 八声甘州(故都迷岸草) | (83) |
| 水调歌头(秋色渐将晚) | (87) |
| 点绛唇(缥缈危亭) | (92) |

李 纲(四首)

- | | |
|-----------------|--------|
| 六么令(长江千里) | (95) |
| 念奴娇(晚唐姑息) | (99) |
| 喜迁莺(边城寒早) | (104) |
| 苏武令(塞上风高) | (108) |

胡世将(一首)

- | | |
|-----------------|-------|
| 醉江月(神州沉陆) | (112) |
|-----------------|-------|

张元干(四首)

- | | |
|-------------------|-------|
| 贺新郎(曳杖危楼去) | (118) |
| 贺新郎(梦绕神州路) | (123) |
| 石州慢(雨急云飞) | (127) |
| 水调歌头(举手钓鳌客) | (131) |

岳 飞(二首)

- | | |
|-----------------|-------|
| 满江红(怒发冲冠) | (135) |
| 满江红(遥望中原) | (139) |

陆 游(七首)

- | | |
|--------------------|-------|
| 水调歌头(江左占形胜) | (143) |
| 秋波媚(秋到边城角声哀) | (147) |
| 汉宫春(羽箭雕弓) | (150) |
| 夜游宫(雪晓清笳乱起) | (154) |
| 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 | (157) |
| 谢池春(壮岁从戎) | (159) |

鷓鴣天(家住苍烟落照间).....	(163)
范成大(三首)	
水调歌头(细数十年事).....	(166)
鷓鴣天(休舞银貂小契丹).....	(169)
满江红(千古东流).....	(172)
张孝祥(七首)	
水调歌头(雪洗房尘静).....	(176)
六州歌头(长淮望断).....	(181)
水调歌头(濯足夜滩急).....	(186)
念奴娇(洞庭青草).....	(190)
水调歌头(江山自雄丽).....	(194)
浣溪沙(霜日明霄水蘸空).....	(198)
水调歌头(湖海倦游客).....	(200)
辛弃疾(九首)	
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	(205)
永遇乐(千古江山).....	(209)
南乡子(何处望神州).....	(214)
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	(217)
鷄鴟天(壮岁旌旗拥万夫).....	(221)
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	(224)
水龙吟(渡江天马南来).....	(229)
贺新郎(老大那堪说).....	(233)
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	(238)
陈亮(五首)	
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	(242)
念奴娇(危楼还望).....	(247)
贺新郎(老去凭谁说).....	(251)

贺新郎(离乱从头说).....	(256)
贺新郎(话杀浑闲说).....	(260)
杨炎正(一首)	
水调歌头(寒眼乱空闊).....	(264)
刘过(四首)	
六州歌头(中兴诸将).....	(268)
西江月(堂上谋臣帷幄).....	(272)
沁园春(万马不嘶).....	(274)
贺新郎(弹铗西来路).....	(279)
戴复古(二首)	
水调歌头(轮奂半天上).....	(283)
贺新郎(忆把金罍酒).....	(287)
刘克庄(三首)	
贺新郎(北望神州路).....	(291)
沁园春(何处相逢).....	(295)
清平乐(风高浪快).....	(299)
陈人杰(二首)	
沁园春(谁使神州).....	(302)
沁园春(抚剑悲歌).....	(307)
文及翁(一首)	
贺新郎(一勺西湖水).....	(311)
刘辰翁(二首)	
柳梢青(铁马蒙毡).....	(316)
六州歌头(向来人道).....	(319)
邓剡(一首)	
醉江月(水天空阔).....	(324)
文天祥(二首)	

醉江月(乾坤能大).....	(328)
沁园春(为子死孝).....	(331)
后记.....	(336)

前　　言

在我国古代文学中，词是一种重要而又独特的文学样式。它与诗有血缘关系，但不同于诗；它与音乐有不解之缘，但又逐渐脱离音乐而具有独立的文学品格。词的全名叫“曲子词”，“曲子”即燕乐曲调（“燕”同“宴”，因常在宴会上演出，故名），“词”则是与这些曲调相配的唱辞。随着曲调唱法的逐渐失传，一些唱辞独立地传留下来，成为像诗一样供人们诵读的文学作品，后来的文人作家也就索性不管什么曲调唱法，而是仅仅按照某种词牌的字数、音节、韵律的“定格”，如作律诗一般地填写辞句，俗称“填词”。这样，作词就与通常的作诗无异了。

词起源于隋，在唐至五代十国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到了宋代，词的创作蔚为大观，进入成熟丰收期，出现了灿若星辰的大小词人，形成了宋代词坛上两大词派——婉约派和豪放派。在当时，词人们未必有明确的流派意识，只是自觉不自觉地追求、归向于某种创作风格，形成一种颇有影响的创作倾向或潮流，人们自然而然地将其归为一派，这大概就是宋代两大词派的由来。

“豪放”这个词大约可远溯到南北朝时代。《北史·张彝传》说：“彝少而豪放，出入殿庭，步眄高上，无所顾忌。”后人用以论诗，谓诗有“豪放”风格。晚唐司空图著《二十四诗品》，其中之一品即名曰“豪放”。到了宋代，人们则又用以论词，如陆游称东坡词“公非

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声律耳”。（《历代诗余》引）至明代，有人将词划分为两体或两派：“词体大约有二：一婉约，一豪放”（《古今词论》引明张蜀之说）；又《文体明辨序说·诗余》也说：“有婉约者，有豪放者。婉约者欲其辞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随着这种认识的愈来愈为人们所认同接受，对于宋代两大词派的认定也就愈益明确了。

—

豪放词派的发轫之始，大约可追溯到北宋中期的范仲淹。在此之前，文人词多是柔丽缠绵情调，虽有时也偶闻一二豪放之声，但并未成为一种自觉的创作意识。

北宋初年，在结束了自晚唐百余年来的纷争局面之后，经济开始得到恢复发展，国家进入安定繁荣的时期。这时的宋代统治阶级，也有了安享太平奢华生活的条件。宋王朝施行“恩逮于百官者唯恐不足”的政策，竟然鼓励文臣武将“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置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史·石守信传》）。在最高统治者的提倡鼓励下，达官显要、王公贵族无不沉迷于酒宴歌场。而同样陶醉在歌舞宴乐生活中的词人们，所能吟咏出来的，自然也不外是秾丽绵软之辞。

及至仁宗、神宗时期，在社会繁荣背后潜藏着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日益加剧，宋王朝的统治面临着种种危机。这时一些富于远见卓识的有志之士纷纷提出政治改革的主张，并努力寻求实施，范仲淹即其中之一。范氏出身贫寒，少有大志，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

胸怀，曾在西北军中镇守边关，抗击西夏贵族军事集团的侵扰，后又主持过“庆历新政”，谋求政治改革。作为一位具有忧患意识和变革精神的著名政治家，他的词作具有不同于一般文人词的宏阔境界和磅礴气势。他的边塞词，如《渔家傲·秋思》，写边塞风光和羁旅情怀，苍凉慷慨，沉雄悲壮。他留下的词作不多，但可见出其迥异的词风，标志着他的创作在自觉地追求一种豪放风格。

被列宁誉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以其政治家的雄伟气魄推行“变法”，它虽因统治阶级中保守势力的阻挠反对而失败，但其影响是深远的。在文学创作上，他同样气度非凡，散文雄健峭拔，诗歌清新遒劲，词作步武范仲淹，追求豪迈雄放，如他的《桂枝香》(登临送目)、《浪淘沙令》(伊吕两衰翁)等怀古咏史词，叹古感今，境界阔大，显出政治家特有的襟怀气度。在宋代豪放词的形成过程中，自有其一席之地。但和范仲淹一样，因词作不多，影响有限。

历来为人们所公认的豪放词的奠基者和创始者是苏轼。他青年即入仕途，一生在新旧党争的政治漩涡中浮沉，造就了他超旷豁达的个性气质，再加上他的多才多艺、才情奔放，使他的词作丰富多彩，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刚健激昂的豪放词。宋人胡寅在《酒边词序》中说：“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王灼认为，苏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碧鸡漫志》)。实际上，在《东坡乐府》三百四十多首词作中，豪放词所占的比例并不大(约十分之一)，但在婉约词占统治地位的北宋词坛上，苏轼的这些豪放词无疑是高标特出，其成就影响超出了他数量大得多的其它词作。

在苏轼之后，苏门弟子中的黄庭坚和晁补之都在一定程度上受苏轼词风的影响，他们有些词作或感叹时事，或抒写情怀，也都显得秀逸豪放，似得其师真传。另有被称为“词中怪杰”的贺铸，词作颇丰，他的词题材多样，风格多变，总的看是以婉丽为主，但也有一部分受苏词影响，颇为豪迈雄健，在豪放词的形成中也有一定影响。

“靖康之变”是宋王朝的一次大劫难，金兵攻陷汴京，掳去徽、钦二帝及皇宫所有人员财物，北宋覆亡，中原沦陷。徽宗九子赵构在商丘匆匆即位，不久逃往江南临安（今杭州），偏安江左，史称“南宋”。国破家亡、南北分裂的惨痛现实，不仅打破了封建士大夫们沉醉歌舞宴饮的迷梦，也激荡了文人墨客们在酒乐声色中沉迷已久的情感心态。如果说在北宋太平安乐的局面下词人们尚有可能歌红吟翠，因而词坛以婉约占统治地位，那么随着这种时事之变和人们心态的变化，词风也自然为之大变。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赵翼《题遗山诗》），正是在国家败亡、沧桑巨变的时代条件下，许多词人扭转了自己的创作倾向，豪放词获得了它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

一些原先词风偏于婉丽的词家，此时开始发生转向，如早年词“甚婉丽，绰有温、李之风”的叶梦得，南渡之后的晚年之作，却“落其华而实之，能于简淡中见雄杰”（《题石林词》）。此外，陈与义、向子坤等的后期词作，也都或多或少染上了豪放词的色彩。

南宋词坛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批豪放派词人的崛起。他们有的是力主抗战的朝廷重臣、著名将相。如李纲，北宋末年曾任兵部侍郎和尚书右丞，汴京被围时亲率将士抗敌。至南宋高宗时起用为宰相，积极主张抗金复国，后几经浮沉，未展其志。他的一组咏史诗，

如“宪宗平淮西”、“真宗幸澶渊”等，借古讽今，意在规劝鼓励君王亲征抗战，同时也抒写了自己抗战御敌的爱国热情，风格沉雄劲健。另有《苏武令》这样直抒豪情的作品，发出了“调鼎为霖，登坛作将，燕然即须平扫。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的铮铮誓言，显示了词人誓扫敌虏、恢复故国的豪迈气概。岳飞作为一代抗金名将，以其叱咤风云、可歌可泣的抗金爱国壮举名垂千古；同时他仅存的几首抒写平生壮志和抗敌决心的词作也广为传诵，尤其是那首《满江红》（怒发冲冠），慷慨激昂，忠愤激烈，气吞山河，唱出了那个时代抗战爱国的最强音。此外还有胡世将，也是一位抗战派的著名将领，战功卓著，他现存词仅一首《醉江月》，步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原韵，它没有文人词那般讲究修饰，却显出武将特有的直爽豪壮，在南宋初期的豪放词中颇有特色。

其次，是一批具有深沉爱国情感和忧患意识，极力主张抗战复国的有志有为之士，纷纷以词代言，抒亡国之恨，写忧国之情，发救国之声，情辞激昂，感人至深。其中比较突出和有代表性的是张元干、张孝祥、范成大等人。张元干原为李纲幕府的僚属，曾积极支持协助李纲抗金。李纲遭谗罢相后，张元干也因此获罪。但他不畏株连迫害，仍作诗填词赠送给李纲和竟敢上书请斩秦桧等投降派而招致打击的胡铨，给他们以同情和声援，表达对投降派的义愤，同时寄寓自己深沉的爱国情感，词作中充盈着一种抑塞磊落之气，其忠愤之情令人感动。另外他自抒情怀的作品也写得慷慨激昂，大气磅礴，如“一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石州慢·己酉秋吴兴舟中作》）；“犹有壮心在，付与百川流”（《水调歌头·追和》）等，都是广被传诵的名句。张孝祥也是坚决主张北伐收复中原，反对和议，因

而遭到打击。但他初衷不改，坚持填词作歌，为抗金复国而呼号。当闻知采石矶抗金得胜，即作《水调歌头·闻采石战胜》以庆贺，并发“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的壮语；而当听说朝廷在金兵进犯时竟遣使求和，愤而作《六州歌头》，写下了：“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这样悲愤不已的词句，主战派大臣张浚读后也不禁伤心罢席。同时代人汤衡认为张孝祥的词与苏轼词“同一关键”，是“能继其（苏轼）轨者”。总的来看，“二张”的爱国词作无论数量和质量，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是比较突出的，是豪放派中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家。

“豪放惟幼安称首”（《花草蒙拾》）。在南宋特定的时代条件下，辛弃疾把豪放词的发展推向了最高峰。辛弃疾从小生活在金兵占领区，二十岁即起兵抗金，长驱渡淮，投奔南宋。他一生“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期望在抗金复国事业中有所作为，但由于投降派的猜忌排挤，一直壮志难酬，失意潦倒。他只有将自己满腔的壮志豪情和忧思悲愤寄托于笔下，熔铸于词中。辛弃疾的豪放词，一是题材内容极为广泛，无论是登山临水，赏月观灯，送亲别友，贺礼祝寿，还是咏史怀古，书壁题轩，旅兴感怀，朋友酬唱，都可以借题发挥，托物寄兴，寄托家国之忧，抒写报国之志；咏叹千古兴亡，抨击腐败时政，“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辛稼轩集序》），忠愤感人，豪纵奔放，这一切都源于词人炽烈的爱国激情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壮阔胸怀。他将词与时事政治结合得这样紧密，这在词史上是空前的。二是在艺术形式上冲破一切束缚，进一步解放词体，以诗为词，以文为词，乃至以议论为词，在词中大量用典，随意驱遣经史语言和故实，采用民间口语入词等，极大地丰富了词的表现力。当然，辛词并不仅限豪放一格，同时也还有不少清奇婉丽之作，但无疑以豪放

词的成就最为突出，是公认的豪放词派的魁首。

与辛弃疾差不多同时的豪放派词人还有陆游、陈亮、刘过等人。陆游是南宋伟大的爱国主义作家，其诗名超过词名。但就他的一百多首词作来看，有相当一部分是颇有影响的豪放词，如《汉宫春》（羽箭雕弓）、《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谢池春》（壮岁从戎）等，以文人之身，作勇武之词，展杀敌之志，抒报国之情，气魄博大雄奇。杨用修说他“雄慨处似东坡”，刘克庄称许“其激昂慷慨者，稼轩不能过”（《后村诗话》），可见其词风极近苏、辛。陈亮和刘过有共同之处，他们都才气超迈，怀着济世报国的壮志，但却仕进无路。他们以一介布衣之身，始终关心时政国事，忧国忧民，为抗金复国而到处奔走呼号，在词作中抒写寄托自己强烈的报国之志和爱国之情。他们也都与辛弃疾交往颇厚，不仅在情感志向上与辛相通相投，而且在词风上也大受其影响，同为当时著名的辛派词人。

到南宋后期，较为出色的辛派词人有刘克庄、陈人杰、戴复古、刘辰翁和文天祥等人，他们继承了辛派词人的爱国主义传统，忧怀国事，抒写抱负，各有特色和成就，但基本风格仍归于慷慨豪放。

宋亡之后，整个词的发展由高潮逐渐走向低落，豪放词也随之趋于衰微，虽然金元明清各朝也都仍有人仿效苏、辛作豪放词，但无论是数量还是艺术成就都难以与宋代相比，故此略而不论。

二

“诗庄词媚”、“词为艳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似乎是一种既定之论，那么人们何以会有这样的观念

呢？这也许与词本来的品性和命运相关。

如同古代的乐府歌辞一样，曲子词本也是产生于民间、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艺样式。从本世纪初在敦煌莫高窟经石室中发现的“敦煌曲子词”来看，就多属唐代（兼有五代）的民间创作，情调颇为朴素清新。这种吟唱结合、生动活泼的艺术样式，也为封建统治阶级所看中，成为王公贵族和士大夫阶层宴饮消闲时极好的娱乐品。在灯红酒绿之中，舞女歌姬香袖掩面浅斟低唱，千种风情，万般媚态，相伴靡靡之音，必是温软香艳之辞。在此种风气薰染之下，封建文人墨客们的依声填词，无论娱人还是自娱，也都无不追求绮罗香泽之态，绸缪宛转之度，这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婉约词风。在词的发展历程中，婉约之风可说一直延续不衰，以至人们干脆以艳、媚为词之本性，以婉约为词之正宗。

如果说在词的前期发展中自然形成了媚和艳的品性和“大抵以婉约为正”（《古今词论》引）的基本格局，则豪放词的出现显然就是一种变体、变调。那么发生这种变化的根源何在呢？刘勰曾说过：“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文学之变的根源就在时代生活和作家心态的变化。豪放词在宋代词坛崛起，从根本上说是词这种文学样式走出歌楼舞榭，与时政国事和社会变革相结合的结果。

从上节的简述可知，豪放词是发端于北宋中期社会变革的年代，这决不是偶然的。范仲淹和王安石作为北宋著名的改革家，他们已经感受到了当时社会的内在矛盾和危机，顺应了时代变革的要求，努力推行“新政”和“变法”。尽管他们的改革都以失败告终，但可贵的是他们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和敢为天下先的气度。这种精神气度反映了到他们的诗文里，同

时也带到了向来被视为“艳科”的词作中，这就是一个不小的突破。虽然此举对他们也许还只是一种偶然的尝试，作品不多，影响也不大，但毕竟开始打通了以词抒写时政国事和壮志情怀的道路。与王安石处于同一时代的苏轼，虽政见与王相左，但对国家兴衰命运的关注则是与王相通的。他一生在政治漩涡中浮沉，既领略了时代政治风云的变幻，也饱尝了种种人生况味，他把自己在这个时代的经历感受，把对时政国事的关注与忧思，把超旷的个性、豁达的品格、高远的志向和奔放的才情，都流注于笔端，寄写在词中。这使他那些具有豪放风格的词作显得那样非同凡响，标志豪放词由初创走向比较成熟。此后黄庭坚、晁补之、贺铸等人称得上豪放之作的那些较有影响的篇章，也几乎无一不是感叹时事、抒写自己变革现实的理想和雄心壮志的。

如果说在北宋覆亡之前，还只是少数政治家和有识之士真正关心国家命运，看出了社会的危机，具有自觉的忧患意识和变革意识，从而在词作中有所寄托，那么随着金兵侵占中原，北宋政权崩溃，人们不能不面对一个南北分裂、民族危亡的惨痛现实。在这样一个到处交织着剑与火、血与泪、恨共仇的时代，凡是具有一点民族自尊心和正义感的词人，无不集合到爱国主义的旗帜下来，无不发出抗敌救国、雪耻复仇的悲愤呼声，无不表现出济世救国、奋发有为的强烈愿望和壮志雄心。一方面是词人们为强烈的社会责任和爱国情感所激励，奋发而作；另一方面是人们忧国思乡、要求抗金复国的呼声合情合理，南宋统治集团即使不想真心抗金复国，也至少没有多少理由对这种正义的要求呼声进行压制打击，这就使得词人们能够和敢于大发悲愤之声。正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使得南宋